



名人阅读

# 择善而居

文 / 蒋方舟

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《出梁庄记》的讨论会。一个青年男子在会上说：“你们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，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，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。”

这话当然不正确，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：“你去过农村么？”

男子说：“当然去过，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、随地吐痰……”

我忍不住想，这个男子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吧。同情弱势群体、关注留守儿童、送温暖心连心是一回事，和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农民是被塑造出来的。过年时陪父母看电视，发现热播的“现代家庭伦理剧”一个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结婚，农村里的父母来城里探亲，其间发生的所谓“让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笑料”。农民在电视里不讲卫生、强迫女婿买房子、强迫媳妇生孩子，他们是“笑料”的来源，说白了，就是愚昧、蛮不讲理的代名词。

近几年，似乎也少提“知识改变命运”了，改变了之后，又能怎样呢？仍然是被嘲讽的“凤凰男”和“凤凰女”。

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，农民和农村作为“文明”的对照被书写。在农村生活的经历，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，成为苦难的勋章。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，某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，未得逞，被枪毙；而就在

此前，他的邻村，一个男知青，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，女孩子投河自杀，男知青逃回城里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巧合，这样的比较或许是无意义的。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，都是时代的牺牲品，一块乌云笼罩下来，谁也没有逃过。可硬要区分谁的苦难更高贵，更值得书写和铭记，就非常可笑了。

近些年，另一种趋势是学术界的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和浪漫的幻想，因为反感都市的物质和功利，于是把农村描述成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，如同一首田园诗。

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，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，这两种趋势结合，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：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，固守在大地上，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；到了城市，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——那些“现代家庭伦理剧”的结尾，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，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，尘归尘、土归土，作为一种谅解、“皆大欢喜”的妥协。

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无知的，一方面对“阶级固化”痛心疾首，另一方面，则希望农民能世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看梁鸿老师的《出梁庄记》，最震撼的一点，就是农民，尤其是年青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，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，饱受漠视、误解和屈辱，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。

金钱本身，当然不足以构成迁徙的全部动力；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。农村人到城市里谋生，与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，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，是为了孩子和自己有不一样的人生，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、更好的机会，更大的公平、更可靠的安全感。

这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方式创造历史，而如果遭遇另一种情况：农民离开土地，到了城市，却发现以一种贫穷转型到另一种贫穷，而且这种贫穷是毫无出路和指望的，那么，他们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：暴力。

众所周知，法国大革命是由聚集在巴黎周围的乡下移民最早发起的；更近一点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让全世界惊讶，因为它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，而它最初的起源和宗教无关，而是大规模的农民移民城市，严苛的生活条件却让他们意识到通往都市生活的路径只是个谎言，于是上街抗议。“生活”总归是人面对的最原始的东西，宗教也好、外国势力也好、意识形态也好，都是后话了。

从走出非洲开始，择善而居就是人类的进化本能。现在每一个进城打工者，路途不如我们的祖先艰辛，他们承受的无奈与屈辱，却比我们的祖先要多得多。

我们觉得走上戛纳红毯的王宝强，是励志的，是“实现中国梦”；另一方面，却禁止打工者分享自己的权利和机会，要求他们做出牺牲。这种矛盾，这种抛弃，实在是过于残忍了。



《早恋》  
肖复兴 著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1987年7月出版

个人书架

# 凡烟已落尽 重拾枕边书

文 / 王军

书对人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，我们都曾在读书中改变了人生。

童年的时候，邻家的“小石头”有很多书，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等等，让我日思梦想。“小石头”是村支书的儿子，小人书多得不得了，却很少看。“小石头”天天手里拿着几本，兜里揣着几本，从村头到村尾就那么大摇大摆地炫耀着，勾得我与村子里的一大帮小孩子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眼巴巴地瞅着。

一次，去远房表叔家串门，发现表叔的床头有本《三侠五义》，便趁人不注意揣入怀中。回家后，白天去村头跟“小石头”叫板，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与展昭、白玉堂过招，很快便被父亲发现。父亲的大手毫不留情地揪住了我的耳朵，书自然是物归原主。

上高中时，在“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”的激烈竞争中，我却撇开“数理化”，优哉游哉地躲在学校的图书室里，贪婪地读着那些沉睡着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偶从一本杂志中知晓了那个年代最火的书，便铆足了劲想得到它。在啃了两个月的咸菜疙瘩后，终于把那本最火的书买了下来，它就是肖复兴的《早恋》。拥有《早恋》的我，瞬间“红”遍整个校园，跟在我身后的男同学、女同学也是一大帮一大帮的，我俨然成了当年的“小石头”。可我这个“小石头”却招来了班主任的严厉训导，书被没收了。

参加工作后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书已不是话题。曾一度疯狂买书，从《资治通鉴》到四大名著，从《静静的顿河》到《巴黎圣母院》，书成了我真正的枕边之物。埋头读书，在不同的风景里收获不同的人生感受，成了生活的习惯。

然而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交际应酬、扑克麻将渐渐塞进了我的生活，与书便有了疏远。

那一年，费尽口舌才把父亲从乡下接到城里，本想陪父亲多说话、聊聊天，却天天应酬不断，夜夜大醉而归。父亲看着我的样子沉默不语。

一天，已经买好了回乡车票的父亲对我说：“书房很久没进了吧，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找个收废品的把那些书卖了吧。”

我惊讶地对父亲说：“怎么能卖了呢？那可是我的宝贝啊！”

父亲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都落上厚厚的灰尘了……”

父亲的话让我警醒！

曾几何时，我们习惯被繁华的社会所诱惑，灯红酒绿，觥筹交错像鸦片一样，与我们不离不弃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又被神奇的网络所迷惑，新鲜火辣，永不撤席像快餐一样，让我们立等可取。

凡烟已落尽，何处惹尘埃？虽然还有那么一些人人为书“抠”着墙皮，然而，书，真的成了摆设，手不释卷已是一个遥远的传说！

凡烟已落尽，重拾枕边书，人生，需要在喧嚣繁杂之后，留一隅书香！



《在大海边》  
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4月出版  
《春天最初的微笑》  
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7月出版

往昔岁月

# 夹在诗集里的两枚“粮票”

文 / 薛原

那天整理书橱，偶然翻检出几本1980年代买的诗集，尤其是几种外国抒情诗选，都是上海译文社出版的，有的署着编者的名字，是诗人方平。但大多往往没有编者的署名，多是译文丛刊的诗歌特辑，如《在大海边》、《春天最初的微笑》等等。偶一翻阅，突然在《在大海边》里发现了两枚连接在一起的“细粮壹两”的“粮票”。这是我当年曾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食堂内部“粮票”。意外看到这两枚印制简陋的“粮票”，感觉有些恍惚。记忆里一片褪色的印象：还有这样的“粮票”啊。如果不是实物为证，我很难再想起这样的“细粮粮票”，既然有“细粮粮票”，当时也应该有“粗粮粮票”，特意和当年的老同事联系，说起当年单位食堂里的粮票，老同事思索再三，说：当年是有细粮和粗粮粮票，“细粮”是白面馒头，“粗粮”是米饭，但后来没这样严格了，都变成了“细粮粮票”……

这本《在大海边》是上海译文社1983年4月出版的，看版权页可知当时的印数是五万八千五百册，定价一元四角。当年一本诗集的印数

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想象啊。这套书后边的几本，如《春天最初的微笑》是上海译文社1985年7月出版的，印数是两万册，定价是二元一角五分。两年的时间，同样差不多篇幅的一种译文丛刊的诗歌特辑，从印数和定价上已经看出了社会的变化，尽管印数减少了一半多，两万册的印数，在今天看来，仍是难以想象的。今天别说是一本诗集，就是一本短篇小说或散文集，印到一万册都是值得作者自豪的。

细想起来，这两枚“粮票”应该是在1985年左右的，那时我有时候会在单位食堂吃饭，还是需要拿粮票去换成单位食堂的“粮票”的，往往是菜金加上“粮票”，才能打饭。之所以加上“有时候”，因为我时常不在单位的食堂吃饭。不在单位食堂吃饭的原因很简单：一个是单位离家不远，往往中午我会回家吃饭；其次是我们海洋地质调查的工作性质，往往会出差外地或出野外和海上作业，一年到头，真正在单位食堂吃饭的日子不是很多。

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正是梦想最盛的季节，也是我买书最疯狂的季节，手里有了工资，尤其是

有出野外的补贴后，拿到补贴的第一时间，往往会跑到书店里去，那个年代，各个城市里只有新华书店。若是在外地出差，一般会计算着出差补贴或海上的补贴，把工资之外的补贴都买成书。例如《春天最初的微笑》就是1985年秋天在厦门的书店里买的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厦门，住在厦门大学的招待所里，窗外就看到南普陀的寺庙。那次在厦门住了一个多月，隔三差五，就往厦门大学校园里的一家小书店跑。在那里，除了这本诗集，还买了许多杂书，用现在的眼光看，当时我买书属于饥不择食的状态，就是看到我眼里的好书或有价值的书就立马买下来。至今我也不明白，当时买两卷本《曾国藩日记》的目的是什么，厚厚的两大卷，和《春天最初的微笑》夹在一起，看上去实在是混搭。

二十岁的日子，是读诗、写诗、买书和幻想未来的季节，也是做梦的年龄。那个年代的梦想，虽然有些盲目，虽然有些迷乱，但却给了我青春的激情。也让我沉醉在关于书的梦里，甚至一梦到现在，仍在做着书人的梦——不愿醒来的梦。